

# 桂中年味底色

韦基兰

抑或是什么?记不清了,只记得那声浪裹挟着一种粗粝的生机。平日好静的我,却尤其喜欢那样的热闹,因为那样的小镇,有着强劲而茂盛的生命力,让人不由地欢腾起来。

家里的腊月,早已被父母细细排布:备年货、添新衣、晒腊肉、打米饼、做年糕、大扫除、买鞭炮、写春联……母亲早早嘱咐:“大年初一不可以说‘死’‘病’‘药’,也不能扫地、洗头、洗澡。”每一句叮嘱,都是对岁月的一份虔诚。记忆里,年三十最是忙碌。全家早早起身,杀鸡、炸肉、贴春联。忙完这些,便迎来一年中最郑重的仪式——祭神。我们镇的祭神,是全镇人共同的典礼。每家至少要完成三套“规定动作”:第一套,去甘王庙。那是年三十最热闹的去处,家家端着煮熟的整鸡、鱼、肉、酒、米饭和糖饼,祭拜那位弃官为百姓免皇粮的壮族英雄甘罗。第二套,转回巷口,敬“五谷奶奶”。第三套,回到家中,拜灶神、财神与列祖列宗。我记得,不管我们这些小孩如何眼巴巴望着桌上的鸡腿,咽了又咽口水,母亲总能视而不见并平静而熟练地按步完成:她口中喃喃低语,向先祖禀报家中一年得失,祝愿岁岁平安、事事顺遂。等这一整套流程走完,年夜饭的香味,才真正飘进心里。饭后,镇上那口冬暖夏凉的“闷水”,便

涌起热闹的人潮。因着“初一不洗澡”的老规矩,全家匆匆沐浴。接着,我和姐姐就抱着一大盆换下的衣物,汇入那条说说笑笑的浣洗长龙里。守岁也总是温情脉脉。父亲会移开平日的小火盆,搬出大木柴,在堂屋正中燃起一堆旺火。全家围坐,火光在每个人脸上跳跃,明明暗暗,像岁月的波纹。父亲讲古,或是我们小孩瞎唱乱跳。那时没有手机,没有匆忙,只有火光噼啪作响,温暖在空气里静静流淌。

待到零点钟声叩响,鞭炮声如约炸响,震彻夜空。新的一年,就在这喧腾与安宁的交界处,庄严降临。那时的年,是一场虔诚的仪式,一次完整的团圆,一份扎扎实实的盼望。后来,我们姐弟都离开家,再回去,也多是匆匆。年味似被抽走了筋骨,软塌塌的,撑不起记忆里那副浓墨重彩的框架。如今,我们陪在城市的的水泥丛林中。时代像呼啸的列车,连节日也被裹挟着狂奔。物质丰盈成了寻常,年夜饭不再是一年一度的奢望,就像鲁迅在《社戏》里回忆的罗汉豆,往后再好的豆,也吃不出那夜的滋味。如今,鸡腿随时可啃,新衣随时可添,可那份在匮乏与期待中积攒了一整年的香醇,却再也嚼不回来了。就连故乡“闷水”边喧闹的浣衣场景,听说也被洗衣机取代,人影稀落。人人都说:年味淡了。其

实,年味的流转,跟人的成长是一样的。我们不必执意找回旧日氛围,于是,我们家跟随时代步伐,努力用新的方式留住年味。“家庭春晚”便这样一年年办了下来。随着儿孙渐次到来,家族如树添了新枝。再远的路,也要在大年初二这天赶回。小院被布置成斑斓的舞台,可以唱歌、跳舞、演奏、朗诵、魔术、走秀……孩子们手绘节目单、自创谜语、设置游戏抽奖,下一代的创意,像早春的芽,一年比一年新鲜蓬勃。在这一晚的笑声里,在那些或许粗糙却绝对真诚的表演里,我们悄然完成了属于这个时代的、微小而郑重的年度仪式。

当然,如今的年也更多元、更丰富。尤其在年轻人心中,年味早已蜕去刻板仪式的硬壳,化作一种主动择取的安宁,是睡到自然醒的慵懒晨光,是闲赏丰富多彩的活动,是旅行路上的新鲜光影,是与三两知己静静相对,不须寒暄,不必扮演。在这个求快的时代,过年最珍贵的,是一家人在一起。只要这一刻,我们属于生活而不属于奔波——这便是最好的年,最真的年味。



扫码聆听更多美文。

## 生产队里的集体狂欢

韦芳春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、计划经济主导的年代,生产队在大队的领导下,不仅承担着组织农业生产、分配劳动成果的重任,也将每个家庭和每个个体紧紧相连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知道,生产队集体养猪,每年农历十二月廿七就给社员放假了。杀猪过年,是生产队年末的一项重要活动,这不仅是对社员一年辛勤劳动的犒赏,更是集体生活中难得的“狂欢盛宴”。杀猪过年的温馨场景,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

在我们大乐双告村有首童谣在流传,每年进入农历十二月,老人家就教我们吟诵:廿七杀猪打鱼,廿八杀鸡宰鸭,廿九酿坛米酒。在那个年代,进入农历十二月廿七,生产队就给社员放假,安排部分社员开始杀猪,放鱼塘水打鱼了。当年,我年纪还小,父亲是生产队长。但每年生产队的杀猪过年,我都跟随父亲前去旁观。天还未大亮,父亲就起床到生产队的养猪房和家人们一起洗锅头烧水准备杀猪。有的人磨刀、有的人挑水、有的人劈柴火……猪房的木门被推开,五六头身上用油漆编号的猪被赶到外院,它们哼哼着,似乎在寻找食物。四叔是村里的杀猪能手,手里拿着一把铁钩针,朝着编号的猪下巴一钩就拉到晒谷场,猪就“嗷嗷”大叫。随后有三四个男丁上前,有的抓猪耳朵,有的人抓猪尾巴,有的拿绳子捆猪的脚。随后大家把猪抬到准备好的四脚板凳上,大家齐心协力按住猪。这时候,四叔拿着尖刀对猪的尾巴用力一刺,猪毛就随抽刀的瞬间喷射出来。女人们拿盆去接猪血,不到十分钟,猪就全身软了。烫猪毛的水是在晒谷场提前烧好的,大铁锅里水“咕嘟咕嘟”冒着泡。猪被大家抬上大铁锅上的木板,滚水一浇,白汽“轰”地炸开,混着猪粪的臭味,熏得人直往后退。四叔却毫不在意,他用铁铲熟练地刮着猪毛,边刮边喊:“加把火!毛不烫透,刮不干净,肉皮都臊,白瞎了这好猪!”他的声音在白汽中回荡,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。

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,每一头猪都是集体经济的宝贝,从春到冬,生产队安排人专门照料,精心喂养十几头猪,一年下来,生产队除完成拿去给国家分配(大乐食品站)的任务外,剩下的就留待农忙“双抢”和年底宰杀,让全队人都能沾沾荤腥。

猪被大家拿刀把毛刮干净后,便开膛破肚,清洗屎尿,分割骨肉。接下来最热闹的就是分肉的时刻。会计老韦搬来一杆大秤,秤砣是铁的,沉甸甸的,秤杆上刻着岁月的痕迹,仿佛在诉说着无数个分肉的故事。他把整扇猪肉挂在秤钩上,眯着眼,仔细地看秤杆:“一百八十斤!”人群中“哟”地炸开了锅。“哎哟,这猪养得够大够肥了!”“今年杀两头猪,比去年多杀一头,过一个肥年!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。

肉和骨头分开,按人头分配。队里两百口人,每家能分到一斤。老韦拿着粉笔在黑板写上:张三家,四口人,八斤;李四家,五口人,十斤……孩子们攥着父母的衣角,眼巴巴地盯着秤杆,生怕少分一两——那一两肉,可能是明天的荤菜,是后天的油水,是寒冬里最踏实的温暖,是能让一家人笑出声的宝贝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这一点点的荤腥,就是生活的希望,就是幸福的源泉。生产队的分配制度虽严格,但在杀年猪这件事上,却充满了人情味,让每一个社员都能感受到集体的温暖与关怀。

分到肉的人家,像得了宝贝似的,有的人不愿意瘦猪肉,偏爱肥肉,肥肉好炼油煮菜。四婶是位细心的人,她分得肉后用草绳把肉捆好,小心翼翼地挂在屋梁上——怕猫叼,怕狗啃,更怕自己忍不住半夜割一块下来炒了。她摸着肉,喃喃自语:“这肉得留着过年才吃,平时舍不得。”可转念一想,又笑了自言自语:“算了,今晚先炖点骨头,让孩子解解馋,半年没见荤腥了。”她的眼神里,既有对生活的节俭,又有对孩子的疼爱,那是一种最朴实、最真挚的情感。在那个年代,母亲的爱往往藏在这些细微之处,一块肉,一碗汤,都是对孩子深深的牵挂与呵护。

如今,超市里的猪肉整扇整扇地挂着,包装得干干净净,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那口肉,是掺着汗水的,是带着温度的,是全队人守了半年、盼了半年的“集体狂欢”——从喂猪的糠,到杀猪的刀;从分肉的秤,到炖肉的锅,每一步都刻着“共同”二字,刻着那个年代最朴实的温暖与亲情。那头猪,不只是肉,它是生产队里的“共同财产”,是寒冬里的“温暖希望”,是那个年代最朴实的“公平”象征——无论贫富,每家都能分到一份,谁也不多,谁也不少,像阳光一样均匀地洒在每个人身上,照亮了那个物质匮乏却充满温情的年代。那口肉,吃进嘴里,暖的是胃,甜的是心。它让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,有了最滚烫的年味,有了最踏实的幸福,有了最温暖的记忆。那些记忆,如同陈年的老酒,越品越香,越久越醇,永远珍藏在我们的心里,成为生命中最为宝贵的财富。而生产队的历史,也如同一幅厚重的画卷,记录着那个时代的艰辛与奋斗,也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与希望。



AI制图:罗雅馨

## 甜透石陵三山的旧年味

刘学贵

麒麟山的风掠过石陵的田野,红水河的支流绕着三山村落脚,腊月的清寒裹着壮乡村寨的烟火气,货郎鼓“叮铃咣啷”的声响,总在这时穿过三山村的巷陌,撞开我记忆里那扇落满老家年味的木窗。生在三山村,长在桂中这片红土地上,儿时关于年的所有期盼,一半绕着家里腊月宰鸡的烟火,一半系着年三十祈福的欢喜,而这一切,都离不开父亲从鸡身挑出、小心翼翼收起来的那几片鸡内金。

在三山村的壮乡人家,腊月宰土鸡是刻在骨子里的年份,年三十大清早鸡祈福,更是一年里最郑重的仪式。进了腊月,家家户户便盘算着宰鸡的日子,土鸡是自家散养在田埂坡地的,啄谷粒、吃虫草长大,肉质紧实,既是年夜饭的硬菜,也是祈福的供品。年三十这天还未亮透,村里便飘起了炊烟,灶台灶火烧得火旺,父亲早早起来杀鸡,动作麻利却细致,褪毛、开膛、清洗,一气呵成,将整鸡煮熟至断生,白切鸡的鲜味儿混着柴火焦香,弥漫了整个屋子。收拾好的鸡装在竹篮里,再摆上提前准备好的糖果、糕点,凑成满满的祭品,等天刚蒙蒙亮,便提着竹篮去村里的庙中祈福,求来年一家人安康顺遂,风调雨顺。

而宰鸡时,父亲总会把鸡内金单独挑出来,搁在井里打上来的清冽井水反复揉搓,指尖细蹭神残留的鸡杂碎,动作轻柔如对待稀世珍宝。在三山村的老人眼里,鸡内金既能消化积,护着孩子的脾胃,还能换得孩子的一点甜,自然要仔细收拾。洗干净的鸡内金,摊在壮乡人家常用的竹匾里,搁在屋檐下的晒台,冬日的太阳斜斜洒在红土地上,暖意一点点浸进鸡内金的纹路里,竹篾的痕迹也浅浅印在上面,成了独有的模样。

我总蹲在竹匾旁,小手扒着竹编边缘,眼睛一眨不眨地盯。我怕风刮跑鸡内金,更怕院里的土鸡啄了去。身旁的石磨盘上,阿婆捏着铁锅炒的炒米花塞到我嘴里,颗颗蓬松,是腊月里最常见的零嘴。晒上两三天,鸡内金脆成焦黄的小卷,摸起来干干爽爽,我便赶紧揣进棉袄最里面的口袋,捂得热乎乎的,像揣着三山孩子独有的新年期盼,连跑跳都小心翼翼。等等,终于等来了挑担子走村串寨的

货郎。他们摇着鼓,晃悠悠走过田埂,跨过小河,在村口老榕树下停下,亮着嗓子喊:“换糖咯——鸡毛鸭毛鸡内金,都能换糖咯——”桂中本地的壮话软糯醇厚,在田野上飘得很远,村里的孩子循着声音跑来,兜里揣着攒的鸡毛、瓶罐,眼里满是光,老榕树下一下子成了腊月里最鲜活的风光。

我攥着鸡内金,鞋底擦着红泥土埂一路小跑,手心攥出了汗。货郎的担子是百宝箱,玻璃罐里的糖块裹着彩色糖纸,水果糖、麦芽糖、姜汁糖,样样诱人。小贩接过我的鸡内金,捏一捏掂一掂,用桂中本地壮话笑着夸:“这娃的鸡内金晒得干,给两粒甜的!”两粒水果糖塞进我冻红的小手,那甜丝丝的味道从舌尖漫到牙根,连打嗝都是甜的。那时候不懂清贫,只知道鸡内金是年里最珍贵的东西,而家里能杀土鸡过年、摆白切鸡上餐桌、备糖果糕点祈福,已是街坊邻里羡慕的“富有”。鸡身上的每一样都被细细珍惜,鸡内金能护娃,还能换糖,便更显珍贵。

父亲总摸着我的头说:“鸡内金是个好东西,能消食化积,还能换点糖。”他是土生土长的三山村人,一辈子守着田地,日子朴素,却总把最好的留给孩子。如今才懂,换糖是清贫岁月里父辈用最朴素法子给我们凑的童年甜。没有琳琅的零食,几片鸡内金,一两粒糖,便撑起了一个三山孩子一整年的欢喜,刻进了骨血里的年味。

如今的三山村,早已通了水泥路,村口老榕树依旧枝繁叶茂,货郎却成了记忆里的风景。圩市上的年货堆成小山,糖果糕点应有尽有,年三十的祈福依旧热闹,竹篮里的祭品愈发丰盛,村里的孩子再也不用攒鸡内金换糖,可我再也没尝过当年那两粒糖的滋味。那滋味里,有麒麟山的暖阳,有货郎鼓的清脆,有父亲搓洗鸡内金的耐心,有年三十祈福的温情,还有石陵腊月独有的烟火气,是独属于兴安镇的旧年味。

马年新春的脚步渐近,麒麟山的风又吹向石陵的田野,红水河的水依旧绕着三山村流淌,老家的年味依旧浓得化不开。村口老榕树下再无货郎的壮话吆喝,年三十的祈福却从未缺席,那颗鸡内金换来的糖,那份清贫岁月里的甜,始终藏在心底,历经岁月,依旧清甜。

## 一纸拓印遇见灶王神

原连辉

2月8日,武宣县民间文艺家协会年会在县城老街的原老百货大楼里召开。各类民间文艺家现场写春联、唱山歌、唱京剧、舞龙阵,年味正浓。各种才艺中,最吸引我的,莫过于平素难得一见的,周桂源老师展示的传统拓印技术。

周老师带来的拓印工具,不过是几块黑漆漆的四方形拓印板,大的比档案盒大一点,小的如手掌一般。他把拓印板、油墨、刷子等物件摆到桌面上,这些古旧物件便透出一股厚重的味道来。

周老师在印板上均匀刷上油墨,轻轻在印板覆上红纸,再用工具压住,来回拓印几下,轻轻揭起那张纸,一张活灵活现的“灶君神位”图就跃然纸上,引得大家一阵喝彩惊呼。

这个图案我无比熟悉,就是我们儿时贴在厨房里的那张“灶王公公”啊。

周老师拓印出的这位灶王,国字脸,浓眉大眼,胡须垂挂,宽袍垂膝,头戴官帽端着,和糖果饼之类,恭恭敬敬又喃喃有词地向他朝拜。传说灶王吃了小年夜的这一餐后,就要“上天言好事”去了,要到来年才会返回我们的厨房。所以,灶王在我们家一年里的最后这餐,总不能显得寒酸而亏待了他吧?

而年幼时经常觉得饥肠辘辘的我,对灶王何时上天与何时回来,并不大上心,反正那灶王飞升降落之能事,凡人肉胎的我们是谁也看不见的。我最关心的,乃是从何灶王吃过小年夜饭的这一餐开始,一直到春节,我们的伙食是一天比一天地好了起来,最显而易见的,就是可以顿顿有肉吃,各种年货也陆续品尝到了。而这个一年里最期盼时日的开启,竟是和送别灶王“上天”很有关系。如此一想,这“灶王公公”何止是和蔼可亲那么简单。

曾几何时,乡村的模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各家各户的厨房变得亮堂精致起来,很多家庭的灶台都镶了瓷砖,灶王公公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,也居住到各

式各样的“豪宅”里——新式厨房里有电脑打印的泛金字样的一纸灶王图文,有看起来金碧辉煌的立体灶王神台,还有镶嵌着印有灶王君图文的瓷砖等。然而,看着这些精美的灶王公公,我总觉得好像少了什么说不清的东西。我最怀念的,还是儿时那张普通红纸里的灶王,总觉得更灵动、更亲民、更接地气。

如今,在武宣老百货这栋旧式大瓦房里,周老师的现场拓印展示,让我重见这传统民间手工拓印的“灶王公公”神位图,不禁觉得惊喜和诸多感慨。周老师拓印出十几张灶王图和其他小印板印出的诸如“万事如意”“身体健康”“五福临门”等贴门利是纸,现场晾干后,都被大家带走一空。我也领到了一份,哪怕当做留念也好。毕竟,这儿时才能见到的“灶王公公”,承载了太多的年味记忆。

感谢周老师的一纸灶王神图,让我们的传统年味弥漫在乡土之上。

拱手持着一块牌。灶王的两旁分别立着一男一女,上方各印着五个字,合成一副对联。上联:上天言好事;下联:回府降吉祥。灶王上方有一个门楣,上书“灶君神位”四字。

在我还不识字时,我几乎对所有的神像都敬畏害怕,觉得他们那令人膜拜的尊容中,藏着不怒自威的神韵,这位“灶王公公”也是一样。我独自在那厨房时,既忍不住想多看两眼,又不敢多看,生怕那红纸上活灵活现的神像会突然开口说话。直到我上学识字后,再看看灶台上这张红纸神图,又琢磨那副对联的意思,竟越来越觉得这“灶王公公”应该是个好神仙吧,他日日守在灶台前,逢年过节又接受人们对他的顶礼膜拜,上天后总得帮主人家美言几句的吧?这样一想,从此,我便对这位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”的灶王君不再害怕,再看着他的神像,莫名就觉得亲切和蔼了。

觉得灶王亲切,还跟小年夜有关。这一天,母亲一定会在灶王公公前摆上丰盛酒菜